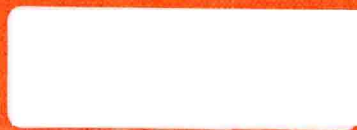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吴子 司马法

陈曦 译注



中华书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陈 曦◎译注

吴 子 司马法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子 司马法/陈曦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1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2912-0

I.吴… II.陈… III.①兵法-中国-战国时代②《司马法》-译文③《吴子》-译文 IV.E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5360号

-
- 书 名 吴子 司马法
译 注 者 陈 曦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912-0
定 价 36.00元
-

目录

《吴子》	1
前言	3
图国第一	12
料敌第二	64
治兵第三	93
论将第四	128
应变第五	158
励士第六	183
《司马法》	199
前言	201
卷上	
仁本第一	210
天子之义第二	263
卷中	
定爵第三	309
卷下	
严位第四	367
用众第五	419

吴子

前言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如果说孙武是最伟大的一位军事理论家的话,那么历来唯一能够与孙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吴起,由此殊荣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地位。早在战国后期,人们便已将孙、吴连称,如《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吴子》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兵书经典。西汉以后,《吴子》仍保持着这种“顶级”兵书的地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史记·孙子吴起传》)。隋朝大将军韩擒虎曾叹服李靖的军事才能道:“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新唐书·李靖列传》)北宋神宗期间,《吴子》被列入《武经七书》,其经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将孙、吴思想远播东瀛。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把《孙子》《吴子》译成法文,使孙、吴的影响辐射到了更加遥远的欧洲大陆。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和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一生辗转多地,充满传奇色彩。吴起事迹见载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最早的吴起传记,则见载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孙子吴起传》,其中的《吴起列传》堪称记述吴起生平的最重要的史

料，现摘录如下。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起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能打胜仗、战功显赫的军事家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吴起身为军事家的才能体现为“善用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深得士卒拥戴,官兵关系和谐。军事家吴起的神采在兵书《尉缭子·武议第八》中也有呈现。该书描述吴起在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左右进剑”,吴起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将领无须在战场上展示剑术,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一席话显示了吴起在战场上镇定冷静、深明职守的大将风度。该书还记述吴起率兵与秦人作战,两军还未正式交锋时,便有一个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杀敌冲动,不顾战场纪律杀向敌阵,斩获两个首级后返回。吴起闻讯下令立刻斩杀这个士卒,军士劝谏道:“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斩钉截铁地答道:“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这则轶事展示了吴起的严明军纪、治军有方。

吴起对魏文侯说“魏国之宝”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从吴起所阐述的“在德不在险”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君主是否有德将关乎国家的兴亡,彰显了他身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见地。到了楚国之后,他被悼王任为楚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对于吴起辅佐楚悼王所施行的变法内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还记述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的变法成效显著,但因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们趁楚悼王去世时发动政变,竟将吴起残忍射杀。

吴起撰述的《吴子》一书,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

艺文志》却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四库馆臣针对这种卷数的巨大差异，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四十八篇”，“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九》）。今本《吴子》共三卷六篇，定型于北宋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关于此书的作者，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如胡应麟、姚鼐、姚际恒、章炳麟、梁启超、郭沫若等），或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篇，或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参读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一书的第一节），总之认为今本《吴子》非吴起自著。关于此书的创作时间，则有战国、西汉中叶、魏晋以后等不同说法。而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成书于战国前期，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

今本《吴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紧紧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展开，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张，又有丰富多彩的“武备”理念；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在不少方面丰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成果，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修文德”的治国理念。

在《吴子》全书首篇《图国第一》的第一节文字，吴起便拈出了统摄全书的核心观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精辟地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紧密关系，认为要统筹处理好治国与治军的相关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军队。吴起继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念。他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要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教导君王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指出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道、义、礼、仁“四德”，营建上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

战”，“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这样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还以慎战思想为前提，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认为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若要巩固胜利，不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强调了较之于加强武备，修明政治尤为不易，因而尤为重要。

二是对战争起因的思考与对战争的分类。

吴起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实际，前无古人地将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基于此，吴起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并分别定义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第一》）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吴起还给出了应对上述五类战争的方法，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战争视为维护礼制的工具，吴起所谓“义兵”，以及“义必以礼服”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儒家战争观的某种认同。吴起的这些思考获得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称赞吴起“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三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一书阐述了极为丰富的治军思想，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介绍的就是“以治为胜”与“教戒为先”。这两条治军原则均载于本

书《治兵第三》。

吴起认为要建设好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首先要遵循“以治为胜”的原则，并说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认为只有严格治兵，严明法纪，士卒才会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吴起在这里还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只有将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吴起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指出了“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军队是由一个一个士卒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吴起在《吴子·论将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论，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鞞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吴起还非常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视激发士卒的士气，在《吴子·励士第六》提出了“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而要激发出士卒的“三乐”，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军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论。

吴起的将帅论，集中体现在《吴子·论将第四》。该文一开篇就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将领应该“总文武”“兼刚柔”，不但要懂军事，刚柔相济，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孙武认为将帅要符合“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对于其中的“勇”，凡人论将往往格外看重，而吴起却匠心独运地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

除了“总文武”“兼刚柔”的总体要求之外，吴起还对将帅提出了“五慎”“将礼”的具体要求。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其内涵分别是：“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意即要求将领具备以下要求：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所谓“将礼”指的是“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指出良将要坚定破敌使命，树立正确荣辱观，绝不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畏惧逃避。

“四机”与“四德”，也是吴起将帅论的重要范畴。“四机”指的是“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其内涵分别是：“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橈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意即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说“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强调“四机”是将帅的必备素质。至于“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将帅具备了“四德”，则“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吴起高度肯定良将的价值道：“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指出良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五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术指导思想。

《吴子》的战术指导思想也极为丰富,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审敌虚实”论与“因形用权”论。《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诫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虚实篇》提出了“避实而击虚”与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的用兵原则。吴起将孙武的上述思想浓缩概括为凝练醒目的一句话——“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第二》),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用兵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论将第四》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命题,指出用兵者应根据战场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达到“不劳而功举”的作战效果。《吴子·应变第五》在阐述如何针对不同敌情而采取相应战术时,便具体贯彻了“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今本《吴子》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论述,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今本《吴子》的版本主要有宋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清朱墉《吴子汇解》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及《四部丛刊》本等。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参校以《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引文、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等,同时还借鉴、参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在注译、整理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吴子》的浅见外,还较为重视吸纳、采录古今研究成果。本书引用的书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共两册,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册,

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李硕之与王式金的《吴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傅绍杰的《吴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吴如嵩等的《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钮先钟的《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少瑜的《兵家法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纂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解文超的《先秦兵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陈宇的《吴起兵法破解》(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薛国安与杨斐的《吴子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黄朴民的《黄朴民解读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在此笔者对诸位前贤时彦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陈曦

2017年10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图国第一

【题解】

本篇的第一节文字，堪称全书的总纲。针对魏文侯“寡人不好军旅之事”的违心之论，吴起联系历史与现实，认为不能仅“修德”而“废武”，也不能“恃众”而“好勇”，否则均会导致亡国丧家的悲剧。基于此，吴子提出了统率全书的思想原则——“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八个字堪称至理名言，精辟地指出了在国家战略思想的顶层设计中，既要重视政治领域的建设，也要重视军事领域的建设，政治与军事二者之间应有和谐的平衡关系。对于维护、巩固国家政权而言，“文”与“武”的作用均至关重要，应妥善兼顾两者，不可偏废其一。

全书以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的对话形式，围绕“文德”与“武备”两大层面展开。本篇题为“图国”，内容侧重于“文德”，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吴子的治国理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君主应重视百姓教化，选贤使能，创建和谐社会。

吴起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还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这样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走上战场，“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奋不顾身地夺取胜利。吴起在篇中提出了“和”的概念，指出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开动

战争机器的必要前提，即所谓“先和而造大事”，指出了四种不“和”的情况，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其二，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四德”。

“四德”指的是道、义、礼、仁，吴起认为圣人应“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意即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道、义、礼、仁均为儒家重要范畴，吴起不仅直接使用这些范畴，还援引了儒家所揄扬的圣王商汤、周武王以阐释这些范畴的意义，彰显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其三，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

本篇最后一节文字，记述了楚庄王因“群臣莫能及”而面有“忧色”的故事。楚庄王充分意识到贤才对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只有拜贤才为师，得贤才为友，才能成就其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以这个故事启发魏武侯不要唯我独尊，要谦虚谨慎，广纳贤才，励精图治。

以上治国理念的落实与否，直接关乎军队建设的成败。本篇有“凡制国治军”一句，将治国与治军并提，说明“军”与“国”密切相连，国事与军事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也说明“文德”与“武备”二者之间难以分割、相互交融的关系。本篇除了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吴起的“文德”思想之外，还展示了他对战争发生的根源与各种战争类型的深入思考。在吴起之前的兵家文献里，人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思想成果。吴起前无古人地将战争根源概括为五种情况，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他还将战争分为五种类型，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这些见解标志着吴起战争理论的深度，标志着吴起对孙武战争观的补充与超越。